



要使用威望的战略手段；国内外的连接主要使用经济引导的战略手段；而与大国关系的博弈主要使用的仍是引导，并逐步升级到主动防卫，但并未完全使用威慑的战略手段。这个三个层面被亚洲国家的接受程度决定了中国亚洲影响力-主导性方面的能力。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这三方面战略手段实施与受影响国家的接受度。

首先，“一带一路”是一个历史概念，很多学者认为重提这一概念蕴含了中华文明历史上王道思想超越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维度的“软权力”³³。根据表一的数据，与中华文化更接近的国家，比如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和韩国，以及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马来西亚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对本地区的积极作用更为认可和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中华文化圈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和缅甸等国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亚洲的积极作用认可度较低。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数据差异显示亚洲国家对历史概念的解读与中方不尽相同。部分亚洲国家担心“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亚洲秩序是中国意在恢复华夷秩序，本国恐沦为藩属国的地位。此外，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是一个强大、先进、统一的中国与一个相对落后无序的亚洲，而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却是一个正在崛起过程中的中国与一个文化身份认同各异，历史问题仍未妥善解决的亚洲。因此，使用这一历史概念形塑亚洲秩序需要处理的不仅是经济领域与亚洲国家的联动，更重要的是增强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圈和历史史观的认可和认同。

第二，“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多个方向延伸连接欧亚沿线国家。根据表一数据，亚洲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更为认可中国对本国的积极影响，但对中国对本地区的积极影响认可度有所下降。这从另外一个方面验证了很多学者提出的亚洲经济安全二元格局现象。从对本国积极影响的数据来看，经济发展预期较好的国家，比如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对中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想法比较积极，而相反经济发展预期较差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菲律宾、蒙古和台湾地区对中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想法比较消极。这一数据趋势隐含着一个潜在危机，尽管亚洲国家普遍认可“一带一路”战略为本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但对本国经济消极的看法也与中国绑定在一起使得中国很容易成为亚洲国家国内经济问题的“替罪羊”。

第三，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同，亚洲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相反它已经与全球体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尽管“一带一路”战略所形塑的亚洲秩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亚洲，且尊重传统域外大国，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区域的存在和地位，但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削弱了部分国家与域外大国固有的连接方式和联系紧密度。表一的数据显示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亚洲国家对中国对本国的积极影响度有所提升，而对本地区的积极影响看法有所下降，同时反映了亚洲对中国作

³³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6-9页；朱云汉：《王道思想与世界秩序重组》，《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2辑，第122-47页。

